

ZHONGGONG SANDA YISHI

中共三大轶事

李蓉 叶成林◎著



人
民
出
版
社

ZHONGGONG SANDA YISHI

中共三大轶事

李蓉 叶成林◎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鲁 静
责任编辑:刘 伟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三大轶事/李蓉,叶成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4722-2

I. ①中… II. ①李… ②叶… III. ①中共三大(1923)-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7008 号

中共三大轶事

ZHONGGONG SANDA YISHI

李 蓉 叶成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14722-2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子.....	1
广州独特的地缘优势.....	6
商议统一战线问题	10
中共中央机关迁广州	15
中共三大面临的主要任务	20
计划召开中共三大的时间	24
代表的产生和集中	26
大会筹备期间的马林	32
为中共三大召开的调查会	36
注意了解中国的国情	40
中共三大“预备会”的召开	44
寻址路标——“1922”	49
只留下墙基的中共三大会址	53
中共三大召开的时间	58
中共三大召开时的全国党员人数	60
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	62
代表分布于不同地域	72
来自东北的陈为人	81
出席中共三大的外国人	84

大会的中心议题和主要议程	86
陈独秀报告:大会花费了 1600 元	89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	94
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99
激烈的讨论和争论	101
工作汇报和大会发言	104
瞿秋白的大会发言	110
蔡和森、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发言	112
张国焘和马林的观点之比较	116
陈独秀的提纲与共产国际的观点	119
中共三大争论的内容和倾向	122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	126
一个未获通过的决议案	131
其他问题的讨论	133
听取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报告	135
制定党纲和党章	138
中共三大党章的新规定	141
关于中央机构的第一个法规性文件	144
加强妇女工作的要求	146

保存下来的大会文献·····	149
两份声援兄弟党的决议·····	153
大会的选举·····	155
陈独秀的闭幕词·····	159
烈士墓前唱《国际歌》·····	162
由《国际歌》想到的·····	168
中共三大的历史功绩·····	171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投入工作·····	173
大会结束才收到的共产国际指示·····	177
中共三大精神的传达贯彻·····	182
青年团二大的召开·····	185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	187
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193
谁是中央局秘书？·····	195
帮助国民党组织的发展·····	198
初步形成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200
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205
推进国民党改组·····	210
国共合作的疑虑·····	212

张国焘给共产国际的信·····	218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220
消除党内小组织·····	226
对中共三大决议的审查·····	228
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加强党的工作·····	232
国共合作开展劳动运动·····	236
国共合作开展青年工作·····	238
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242
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244
关于中共三大回忆·····	250
中共六大上对中共三大问题的讨论·····	257
主要参考资料·····	259
后 记·····	261

引 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端,濒临南海,背依五岭,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通往五大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

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终年绿树葱郁,鲜花灿烂。特别是看到高大伟岸的木棉树开满鲜艳、鲜红而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英雄花时,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华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对外交往的国际著名港口。广州被誉为“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对其有过“四地”的概括,这就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①

近代以来,广州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广州是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英雄城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广州附近的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斗争。为了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革命志士在广州进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896年的广州之役、1903年的广州之役、1910年的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前两次因泄密流产,后两次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是烈士们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终于在1911年10月推翻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共和国。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1913年7月,广东宣布独立。8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合编:《中共三大学术研讨论文集》,广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月,军阀龙济光盘踞广州,大肆杀害革命群众。1916年8月,滇、桂军队进驻广州,赶走龙济光。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提出戡平叛乱和恢复临时约法,后因受到掣肘,1918年5月辞职,前往上海。同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为广州市得名之始。1920年10月,粤军把桂系军阀逐出广东,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为广州市建市之始。

因为广东及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总通信机关。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暂赴上海。1923年1月,粤、桂、滇军把陈炯明叛军逐出广州,湘、豫军也陆续前来。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并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都在中国南方召开。但广州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仅有中共三大一次。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三次是在上海召开,这就是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中共五大在湖北武汉召开。而上海和武汉,都位于中国的母亲河之一的长江边,上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武汉位于长江的中游。只有中共三大,是在位于中国南方珠江流域的广州召开。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上海、广州、武汉,这些地方都是当时全国政治活动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有较大发展的地区。1945年中共七大在中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陕西延安召开,也是选择了具有一定的有利地理位置和政治影响的地区。只有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因为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而移师千里之外,至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莫斯科召开。

1922年7月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租界当局查封,总部迁到北京。当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机关。10月,开滦五煤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举行罢工,在全国产生很

大影响。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到天津,同罗章龙商讨罢工问题。同时,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北京同李大钊会晤,并交给李大钊 1000 元作为支援工人运动费用。

此时,在 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军执掌北京政权的军阀吴佩孚也声称“保护劳工”,北方的政治形势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较为有利。吴佩孚,1874 年生,山东蓬莱人。早年任北洋军阀曹錕部管带,后升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第六旅旅长。1918 年,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他在衡阳通电全国,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1919 年 12 月成为仅次于曹錕的直系军阀首领。1920 年 7 月,他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军,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1921 年 8 月,由直鲁豫巡阅副使升任两湖巡阅使。

吴佩孚指挥直系军阀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军后,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李大钊利用军阀间的矛盾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建议他采取进步措施。于是,吴佩孚在致国会议员电中提出“保护劳工”等四项政治主张。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代表上届中央作工作报告时,谈到中央委员会由上海迁到北京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可见,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北京,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和中共试图借助有利形势加强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有关。

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驻北京,这也和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有关。根据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的形势,苏俄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推出了一个“孙吴联合政府”的方案,即尽可能说服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因此,1922 年 11 月 17 日,越飞致信马林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唐矿工罢工已证明了这一点。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虽然我们已商定只把款交给共产党,但是从共产党那里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 1000 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 400 元”^①。

越飞在致马林信中提出的要求,马林肯定会向中共中央转达。马林对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0 页。

此也有说明：“因为越飞要求，我才到北京来，并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移往北京。”^①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11月17日后，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北京。以前许多著述都认为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北京的时间是1922年10月，而依据越飞致马林信，中共中央机关迁北京的时间应在11月17日以后。^②

1923年“二七”工人大罢工失败之后，工人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北京的形势也急转直下。吴佩孚发出通缉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人。2月15日，马林在北京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时局和二七罢工问题，认为北京政局压迫加剧，中共中央机关^③应随即迁往上海，并提及中共中央机关今后还需要迁往广州更便于工作。

陈独秀也曾解释说：迁到北京后，“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所以，中共中央机关于3月或2月中下旬又迁回上海。

中共中央机关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后反动派猖獗而由北京迁回上海。但“上海迫害得非常厉害”，所以也不适合。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权衡再三，中共中央机关于四五月间迁往广州。

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所说：“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④。广州成为中共中央当时设立机关的合适之地。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解释中共中央机关迁移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改善机构未能实现，二是反动派的迫害。实际上，当时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比党的内部机构的改善问题更为严峻。

所以，中共三大为何会选择广州召开？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生存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② 王树林：《从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驻地的迁移》，见《中共三大学术研讨论文集》，广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页。

③ 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时称中央局。中共二大和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叙述方便，书中按后来习惯称为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后，中国共产党便注意到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广州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活动的中心，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事实证明，广州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中共三大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便从广州迁回上海。

这样，中共中央机关在 1922 年 7 月至 1923 年 9 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四次大迁移，即以上海为轴心，先由上海迁北京，再由北京迁回上海；再从上海到广州，又由广州到上海。最后，还是把中共中央机关设立在上海。这样由南往北，又由北往南的大搬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此例。这也说明中共早期活动的艰难和不易。

广州独特的地缘优势

20 世纪 20 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于 1920 年的直皖战争和 1922 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权。1923 年 3 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因为军阀混战,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人民生灵涂炭。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因此,“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而广州,就是当时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

广州所在的广东大地,孕育了农民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中国变法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苏兆征、阮啸仙等大批杰出人物。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广东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广东应运而生。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党员、团员和党、团组织。

还在 1922 年 4 月,就有共产国际方面就有人提出,将中共的基地迁到广州。4 月 6 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廉斯基-西比西亚科夫在北京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狄克写信说:前几天,青年共产国际工作

人员、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达林来到北京,“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他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

维廉斯基-西比西亚科夫要求筹措经费。他给达林弄到 6000 墨西哥元借款,随后派出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随同达林去了南方。实际上,达林是由张太雷和瞿秋白陪同去了广州。所以,张太雷和瞿秋白便是得到俄方维氏高度评价的两名优秀中共党员了。

维氏在信中还提到,他们打算在广州召开中国青年代表大会,希望这次会议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基础,更何况青年们非常向往我们的组织”^①。

4 月月底,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方针问题。陈独秀亲临广州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也在会议上根据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精神,论述了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会议没有作出决议,但对国民党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

紧接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5 月 1 日至 5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5 月 5 日至 10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5 月 20 日,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广州的主张,并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二是“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三是“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他认为,中国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②。

7 月 11 日,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从中国考察回到莫斯科,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了他历时 17 个月“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并进行有关调查的情况。他在报告中建议:“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0 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5 页。

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负责在中国、日本、朝鲜销售共产主义书籍等工作。而办事处的组织中，“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应有一名共同的代表，3个国家的党各有1名代表就足够了。”

马林还特意说明了广州独特的地缘优势：“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所以他建议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广州，至少在那儿可以公开地进行工作。而对上海，他却印象不佳。“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也“已经完全消逝”。“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①

7月18日，魏金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支部下达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要求中共中央“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到广州并与菲利浦（斯内夫利特曾用名之一，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②这份命令当时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在一块白绸布上，然后缝在马林的衬衣里面，由马林带到中国。在现在广州的中共三大纪念馆里，绸布照片还清晰可见这个“英文命令”。

总之，把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最初是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建议和决定，更准确地说，是共产国际代表代表考察南方，特别是广东、广州后提出的建议。

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个命令并没有能够马上得到执行。其原因就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导致广东局势的突变。孙中山不得不于8月离开广州经香港到上海。这样，共产国际准备将中共中央机关南迁广州的计划暂时搁浅。

魏金斯基在1922年8月写给中共中央的信曾说明，不仅是维廉斯基—西比西亚科夫、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马林、魏金斯基曾众口一词地提出南迁广州问题，连远在莫斯科的季诺维也夫也是赞成的。魏金斯基在信中指出：

“在由季诺维也夫和我签署的写给你们的前一封信中，我们曾向你们作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6—77、66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出一些具体的和原则性的指示,顺便还建议你们把中央委员会迁至广州,那是更适合于广泛合法地开展工作的地方。在吴佩孚战胜张作霖之后发生的一些最近的事件,看来对广州政府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而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①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商议统一战线问题

在共产国际建议中共中央迁到广州的过程中,1922年4月末至6月15日,张太雷陪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达林在广州同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多次会晤,商议建立广州的统一战线问题。在此期间,孙中山于1922年5月4日再次下令挥师北伐。北伐的目标,仍然是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北洋军阀。

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确地阐述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统一战线思想”^①。

6月16日,孙中山一直培养支持的陈炯明围攻、炮轰孙中山所住的总统府,企图将孙中山置于死地。叶挺等全力掩护,才使孙中山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登永丰舰讨逆,与叛军对峙四十余天之久。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

陈独秀一直观察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动态,但却明显对孙中山信心不足。因此,他在6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魏金斯基的信中表示:“我们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②。

7月2日,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但力量有限,陈炯明仍然拥有相当的实力。局势不能很快扭转。

于是,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经香港于14日到达上海。在孙中山避退上海的日子里,孙中山与苏俄代表、共产国际的代表为国共合作事宜进行了多次会谈。

而共产国际也在这年8月,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②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